

农民的儿子 农民的本色

□ 吴东平

斗转星移,转眼间,父亲吴越同志离开我们已 20 年了。随着时光的逝去,进入老年行列的我对父亲的思念日重一日,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梦里经常出现。

父亲 1919 年出生在现高邮市临泽镇营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上面有两个姐姐,祖父年逾 40 得子,自然喜欢得不得了。在父亲少年时,祖父母咬紧牙关、省吃俭用送父亲断断续续上了六个半年(农闲读书、农忙干活)的私塾。父亲有悟性、人聪明,深得私塾先生喜欢。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决定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派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干部到高邮“打前站”。他们到高邮后接触到我父亲,见其有爱国意识、思想进步,就重点动员他参加革命。1942 年,父亲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毅然走出家门,走上革命的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父亲于 1943 年 3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参加革命后,在家乡一带积极发动、组织群众抗日锄奸斗恶霸,破路打坝袭据点,风生水起,搞得日顽心惊肉跳、昼夜不宁,四处张贴布告,要用若干大洋换父亲的人头。因工作出色,父亲进步很快,1944 年就成了抗日民主政府区一级领导。好几个当年新四军派到高邮“打前站”的干部在回忆录中都写道,到高邮开辟新区时,很注重培养本土籍的骨干和干部,在点到具体人名时,父亲的名字总是第一个被提到,可见父亲当时名气不小。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任高邮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1946 年内战爆发,高邮成了国共拉锯战的战场,今天新四军打进来,明天又被国民党挤出去。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组织上从战略考虑,决定北撤,即将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地方武装撤往盐城、山东等地。决定北撤时,仍需留部分同志坚持原地斗争,坚持原地斗争意味着将在更艰苦、更危险的环境中战斗。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坚持原地斗争的同志大部分都牺牲了。江苏省老省长惠浴宇曾说过:“在解放战争中,高邮牺牲的同志为最多。”在县委书记李健召开的留下来坚持原地斗争的动员会上,很多人沉默不语,我父亲第一个站起来大声表态:“李书记,我留下来坚持原地斗争!”这也是我父亲在参加革命后却没有南征北战、千山万水经历的原因。

坚持原地斗争的三年,是父亲一生中经历的最艰苦最危险的三年,说九死一生毫不夸张。父亲曾多次说过,坚持原地斗争的三年,他们成了“夜猫子”,时常白天躲在芦苇荡里,夜里出来活动,敌人封锁猖獗时,在芦苇荡里出不来,几天吃不到东西是常有的事。没有食物,他们就吃芦根、喝冷水。还要忍受蚊虫叮咬,湿衣裹身,浑身破皮烂肉,苦不堪言。父亲有两个长辈亲戚分别住在紧挨着荡边的两个村子里,父亲时常在夜里偷偷摸摸进村讨点吃的,并与两个长辈约好,在他们居住的茅屋临荡的窗台上放盏小煤油灯,有敌情不点灯,没有敌情就点灯。灯亮了,父亲他们就上岸活动;灯不亮,就窝在荡里。著

名导演杨村彬编导的电影《湖上斗争》,就是取材于父亲与他的战友们的这一段经历。1978 年,我旅行结婚,在上海见到杨村彬伯伯时,我问杨伯伯是如何和我父亲熟悉的。杨伯伯讲,为了拍《湖上斗争》,他在高邮体验生活好几个月,《湖上斗争》大部分素材是我父亲提供的。解放后曾任新华社负责人的甄为民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 年我到高邮实地采访,突遭敌人重兵围剿,没有法子只好躲进芦苇荡。在荡里饥寒交迫,亏了区长吴越是本地人,有亲戚住在荡边,有时夜间偷偷上岸讨点吃的,才没有被饿死。

在三年坚持原地斗争期间,让父亲最痛苦、最难忘的是经历了“周家垛”事件。1946 年 10 月 24 日,高邮县委在现周山镇周家垛召开工作会议,被一坏人发现,遂向正在调防的国民党黄伯韬部队报告,县委班子遭国民党正规军包围,苏北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周山在突围时遇大河阻隔,在渡河时不幸溺水而亡;县委书记李健突出包围跑到东荡,很久以后,他的遗体在荡里被发现;临南工委书记狄奔、界首区区长翟光跑进一无人在家的农舍,弹尽后被敌人放火烧屋而牺牲……我父亲因熟悉地形、又会游泳,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父亲生前每次谈到“周家垛”事件都会唏嘘不已、仰面长叹。

我出生于 1951 年,对父亲在战争年代具体的斗争经历知之甚少,只记得“文革”前家里有一把日式小手枪和几发子弹。我 10 岁左右时,一天,父亲擦拭这把手枪,告诉我这枪是×年×月打临泽时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上缴获的。因我年幼,至今回忆时只依稀记得“打临泽,日本军官”等字眼。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任过高邮县县长,泰州专署、苏北行署血防指挥部指挥,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扬州医学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职。因我上的是全托幼儿园、寄宿中学,17 岁便到农村插队,对父亲工作上的事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整天忙忙碌碌,难得有时间与家人交流。

我长大后,接触到方方面面,对父亲的了解和理解逐渐增多,父亲的形象在我心里也逐步“高大”起来。

父亲重情重义,尤其对烈士亲属感情至深。长期以来,父亲把对烈属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作为对烈士最真挚的缅怀。李健烈士的老伴与儿子解放前一直生活在徐州农村老家,父亲任县长时,将他们迁至高邮,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解放后,狄奔烈士的嫂子姚希文阿姨从常州到高邮寻找狄奔的下落,父亲热情接待,后我们两家像亲戚一样常年走动;周奋烈士遗孤周继奋从上海来扬州,父亲与他抵足而眠,给他讲述周奋在高邮的斗争经历和壮烈牺牲的经过;父亲对翟光(原名张耀邦)烈士遗孤张乃善及爱人吴恒英更是视如己出,他们到扬州来看望我父母,拎着一瓶自家腌制的咸菜,抱着一个自种的大南瓜或大冬瓜就是“送礼”,我父母对他们也是遇粥喝粥,遇饭吃饭,从不特意加菜,跟自家人一样随便;某年春节,父亲在高邮过年,有一天他叫我陪他到卸甲供销社去看望周在和

烈士的儿子、周朝定烈士的弟弟周坤,当父亲走进周坤家时,周大哥惊喜交加,嗟嗟了半天,不知说什么是好……

1997 年 12 月中旬,父亲病情严重,已临近生命结束,基本处于昏迷状态。一天,几位领导来看他,问及认识他们否,父亲脱口而出:怎么不认识,你是周山、你是李健,你是狄奔……说出了一长串烈士的姓名,随后沉默不语。我见状真是百感交集,不知用什么文字来描绘我当时的心情。

父亲长期在卫生部门工作,“文革”下放农村三年后重新安排工作,曾在苏北人民医院当领导。家乡来看病的人如过江之鲫,父亲从不嫌麻烦,次次热情接待,还会替人家在经济上算计,在家留餐留宿。苏北医院一些老人都说当时我们家就像公共食堂、招待所。家乡人来时,都会带些土特产,他们走时,父亲定会叫母亲购买一些实用物品作为回赠礼物。这就是父亲,始终记得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保持着农民的本色。

父亲一生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不管在何岗位上,从不沾公家的一厘一毫,一个行政 11 级正厅级干部,甘于过着平民生活,他从不讲究吃、穿、用的档次,生活平民化,吃俭朴、穿俭朴、用俭朴,俭朴得有时让我们做子女的感到“难为情”。

父亲一生淡薄名利。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这一品质。他离休后不久,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1942 年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每年可增发一个半月的工资,1943 年后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每年只增发一个月工资。解放后,父亲历次填履历表都将入党时间作为参加工作时间。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战争年代入党都有一个较长的考察期,怎可能当天工作当天入党呢?更何况还有被父亲动员出来的人参加工作时间都为 1942 年。有人劝他向组织反映一下,他说:“有什么改头,不给组织添这个麻烦。”

父亲对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也很能干,对这一点我没有什么直感,都是从他人处和一些史料中得知的。1953 年,高邮新民滩发生大范围的血吸虫流行病,父亲亲临第一线,指挥防治工作,成效显著,被称为“血吸虫防治专家”,他本人也由此调入血防和卫生系统工作。1988 年,我在高邮接待了曾任过苏北区党委书记、南京军区政委的开国中将肖望东,他问我有一个老县长吴越同志现在何处,当得知是我父亲时,他连讲了两句你父亲很能干、很能干,当时在高邮工作很出色。父亲“文革”期间下放回农村老家的三年,天天和农民一样出工干活,若给他记工分,肯定可以拿到壮劳力的工分,因父亲年轻时就是干农活的好把式。江苏省委宣传部的陆建华同志曾写过《厅长下放第一天》的通讯报道,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父亲逝世前,给组织给家人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嘱,其中一条是要将他的骨灰洒入高邮、宝应两地交界的子婴河。他要回故乡,要和牺牲的老领导、老战友在洒满热血的土地上永远相伴,这就是父亲——一个农民儿子的情怀!

亲爱的值得尊敬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永远的怀念

□ 俞大农

日子过得得快,父亲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 30 年了。父亲是 1987 年中秋这天离开我们的。中秋,象征着全家团聚、康乐和幸福的日子,而我们沉浸在分离的痛苦中。父亲走的那年只有 59 岁,他还没有退休,还没有过 60 岁生日,儿女们还没有来得及孝敬他,他就走了。

父亲生于 1929 年,高邮三垛镇人,弟兄姊妹 5 人,他排行老三。解放前,父亲当过学徒,曾到青岛等处谋生;解放后,他凭着双手打算盘的绝活先后在三垛供销社、二沟供销社、县供销社及县政府统计科工作过,是名会计能手。由于不仅会算而且能写,他于 1956 年 7 月被组织上调到高邮报社任副总编,1961 年 10 月先后在高邮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任秘书、副主任、主任,也曾在高邮治淮工程团、高邮农业局任职,去世前是高邮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父亲 31 岁那年才与母亲结婚,先后生下我们姊妹 5 人。外婆一直跟我们生活,每月还需赡养奶奶。全家大小 9 口人靠父母那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窘迫困顿。我小时候家住公园西大门,紧挨父亲的工作单位高邮报社。一天早晨保姆抱着襁褓中的我与父亲相遇,“老俞呵,我在路上拾到个伢子哦”,保姆打趣道,父亲头也不抬“哦、哦”地答应着急急匆匆地走了。保姆回家笑着告诉母亲,叹气道:“唉,只知道成日带夜地写,写得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了。”

大约 1965 年下半年,我们全家从报社两间宿舍搬到南门前观巷 35 号,在三间普通平房里生活。西房间住着父母,东房间住着外婆、三妹、四妹,堂屋一隔两半,前半段做客厅,后半段做我和二妹的房间;天井西侧的厨房同样也是一分为二,一半做灶台,一半做弟弟的房间。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父母为了节约电费在两堵石灰墙上开两个方洞,放上 15 瓦的灯泡,父亲借着这微弱的灯光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写稿,早晨我起床经常看到一地的烟头,满屋烟雾缭绕。

父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徒成长为一个县的大笔杆

子。他妙笔生花的文字成就了他,但因为香烟和长期繁重辛苦的文字工作,最后他积劳成疾患了肺癌,失去了健康,离开了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离开了魂牵梦绕的政府大院,离开了挚爱的妻子儿女。为父亲送葬那天灵车特地绕行到府前街政府大院即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已改址的高邮州署前,我们姊妹 5 人放声大哭。那年除了我结婚刚怀孕,其余四人都还未恋爱成家,漫漫人生路,我们是多么需要父亲的庇护,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多么需要父亲的臂膀呀!

父亲一辈子担任领导工作但从不动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亲戚、朋友谋私利。我上文训班、考法院的信息均来自外界,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他任农业局局长时掌握全县审批紧俏化肥的大权,可他从来都是按规定按计划将化肥分到最需要的农民手中;他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期间主管分房,不知分了多少套新房给他的下属,可我们一家 8 口人挤在不到 60 平方米的简陋平房里,一住就是 20 多年。父亲去世后全家仍住前观巷,遗体从医院抬回家竟然没地搁置,只好将中间隔墙拆除。前来吊唁的人见到这情形,没有不掉泪的。

父亲工作忙,与子女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子女们从感情上更亲近父亲,因为父亲从不打骂、训斥我们。父亲排行老三,原用名俞友宏,我们姊妹常恶作剧般地学着大人大呼小叫地叫他“三爷呀”“友宏呀”,他也不恼,笑笑,还一声接一声地答应我们,惹得我们哈哈大笑。父亲烟不离手,飞马牌香烟是他的最爱,我们淘气地将空烟盒塞满棉花用胶水粘起来,父亲急吼吼拿烟时拿到的常是一团棉花,我们笑得前俯后仰。父亲下班迟,母亲常叮嘱我炒蛋炒饭,调皮的我将荷包蛋藏在碗底,在父亲狼吞虎咽中一只荷包蛋露出,他的脸上常常浮现出孩童般满足的笑容。有时弟弟犯错了,父亲只舍得用食指和中指两指并拢地敲他手心。我 20 岁时 90 岁的外婆仙逝了,妈妈是小学校长工作忙、家务重,有时下班回家发现家里水龙头坏了、煤炉熄了无法做饭,难免发牢骚、抱怨。父亲从不与她争

吵,背后总是低声下气地乞求我们“不要贪玩哦,要帮妈妈做事哦”。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慈祥和蔼的父亲是我们的开心果。家,也许贫穷、也许单调,但从 not 缺乏生气和笑声。

父亲一生工作繁重,子女众多,经济拮据,住房紧张,但他面对这一切淡然又坦然。他酷爱读书、看报、记笔记,家里再难,订报纸、杂志的习惯从未中断过。他关心子女学习,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做人上教育我们。他说:“贫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挤时间辅导我们学习,帮我们改作文,鼓励我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境遇。在那十年动乱,读书无用论的大背景下,我们虽然没上大学,但工作后凭自学都先后招干、上学。我考上法院后,父亲特地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告诫我:“法院接触社会阴暗面较多,但不能就此说社会一团漆黑,我们的社会主流是好的,要阳光向上,积极要求进步。”我们姊妹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工作、诚实做人、喜爱读书、勤俭持家,与父亲的言传身教分不开,他血脉中弥足珍贵的遗传因子也传给了我们,乃至我们的下一代。

秋初凉,夜苍黄,一份思念两茫茫。三十年后的中秋,在这满城弥漫桂花香气,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时刻,透过晶莹的泪花,我想告慰父亲,母亲在 4 年前也已离开了我们,当年你生病未来得及见面的外孙已当上了警察,今年底他就要做爸爸了,你的孙子今年考上山东大学数学系研究生,3 个外孙女均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且都已参加工作。父亲生前没有留给我们万贯的家产,但他的品格和学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往昔只系事业维,而今迫止生命舟”,这是我尊敬的朱延庆老师送给英年早逝的父亲的挽联,用父亲姓名“维舟”,巧妙诠释了他忘我工作、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

人生有相聚,也有分离,有欢笑,也有哭泣。这是大自然的法则,谁也不能逃避。岁月苍老了容颜,但我们日渐沉淀的心将永远铭记父亲的教诲,唯愿我们坚强,懂得珍惜。

父亲,愿你安息。